

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使命

——著名作家贾平凹访谈



通讯员 胡利江 摄

三江访谈

人物名片

贾平凹，1952年出生，陕西商洛市丹凤县人。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，当代著名作家。曾多次获文学大奖，代表作有《商州》、《浮躁》、《废都》、《白夜》、《秦腔》、《古炉》、《带灯》等。

6月5日，贾平凹应邀来慈溪参加第三届“《人民文学》长篇小说双年奖”颁奖活动，他的作品《带灯》和韩少功的《日夜书》、周大新的《安魂》、李佩甫的《生命册》、林白的《北去来辞》同时获本次长篇小说双年奖。

□记者 陈晓旻

记者：这次您的获奖作品是《带灯》，这个名字很有意思，给我们简要阐述下这部作品的创作情况。

贾平凹：小说《带灯》的主人公带灯是一名乡镇女干部。小说的缘起就是来自一位乡镇女干部。当时写完《古炉》以后有一段休息的时间，我就跑了甘肃、山西、河南好多地方，到农村了解最基层人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。正好一次下乡时，我认识了一位乡镇女干部，她在大山深处的一个乡镇综合治理办公室工作，后来她陆续和我联系，在短信里讲述她的生活和工作，给我提供了素材。

小说中，女主人公原来的名字叫萤，但她在翻看辞典的时候，发现里面经常说“腐草化萤”，就是说萤火虫生于腐草里。她觉得这不好，就把名字改成了带灯。她这个灯是自带的，而不是别人给她的光亮，所以叫带灯。带灯是樱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，每天的工作就是处理群众上访。这个人物是在最基层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。在当地人看来，乡镇干部一个月挣两三千块钱，比较稳定，她可以在那儿一直干下去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她一方面要尽到责任把工作干好，另一方面她有自己向往的东西，但这些向往的东西有的是完不成的。

萤火虫不是火把，也不是日光灯，它的光本身就是微弱的。小说中，带灯后来心理受到伤害，脑子也有些问题，生了好多病。在作品的最后，出现了一大片萤火虫。写到这儿的时候，我在想，每个人如果都像萤火虫一样，凭着自己的一点点光亮，还是可以照亮好多人。

记者：感觉您这部作品的风格和以往的不相同，而是多了一些散淡的感觉？

贾平凹：在小说结构中，写实际的东西给人的感觉比较累，所以我加上了一些抒情、明亮的东西，以增强读者的阅读快感。我想尽量用简洁、明快的方式把故事讲明白，而以往的故事可能细节描写比较多。这可能跟年龄和心态有关，几十年以来，我喜欢明清以至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学语言，它清新、灵动、疏淡、幽默、有韵味。我模仿着，借鉴着，后来似乎也有些像模像样了。而过了60岁，我开始喜欢中国两汉时期那种史的文章风格，没有那么多的灵动和慰藉、委婉和华丽，但它沉而不靡，厚而简约，用意直白，下笔肯定，以真准震撼，以尖锐敲击。

《带灯》这个故事关注的是中国最现实的问题，这个题材跟自己目前的文学追求也有契合的地方。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讲，要真诚地呈现生活，这样才可能把真实的东西贡献给读者。

记者：您一直说自己是农民，您的作品主题大多也是关于农民、农村和家乡。农村题材会是您永远的选择吗？

贾平凹：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使命，农村是我熟悉的氛围，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把这个题材写透写实。中国是个农业大国，骨子里依然是农耕文明，尤其在西部农村，不管现代生活如何发展，依然继承着原来的农耕文明，这就像是一种文化基因，轻易很难改变。而且如今处于社会转型期，有很多振奋人的东西，同时也有令人焦虑的东西，各种矛盾都在这个时期激化。面对这种现象，每个作家就应该有自己的思索。既不能不停地歌颂和表扬，也不能一味地否定、批判。你怎么观察、把握这个社会，是一个作家很重要的素质。

除了深入最基层的农村了解生活，我还每年去北京、上海和广州，了解大都市最时尚最前沿的东西，用两头来把握中国目前，这样才能正确地了解整个社会，尤其是转型时期的真实社会状况。因为很多人出去打工，他们的生活就在城市和农村的两头摇摆，尤其是新一代的农民工，他们喜欢城市，但是又融入不了大都市。现在农民的生活，和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时候都是不一样的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。农村的危机就是没有人，年轻人都不回去了，这是最大的危机。

在生活中，一个人老主持公道，就有德、有望，公道主持得好，人们就说这个人“德高望重”。作家在面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时，也是在说出公道话。这个公道话建立在国情、民情、实情的基础上，作家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，一定要面对真实的社会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，不光要真实，还要有真知。

记者：文学评论家陈晓明说当代文学的走向需要现代性问题，也就是现实主义的传统如何和现代性接轨，您对此如何理解？

贾平凹：传统和现代性都是模糊的概念，现代意识应该是一种人本意识，是大多数人在想什么的潮流。我对现代性的理解是经济发达后，随着人们个性解放想法更为自由，人获得了一种自觉自由的状态，但这快速获得的一切也导致很多矛盾和问题的出现。

社会转型期出现了问题和矛盾，这是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，对于作家来说，反而是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想像的空间，这是一个大时代，也是让作家可以大显身手的时代。现在的农村题材作品，80后、70后跟我们50后写的就不一样了，农村已经在发生变化了。欧洲如今的乡土文学就是田园文学，或许多年后我们现在的农村题材作品也会慢慢消退消失了。怎样重视这种转型期的困境，通过作品引发社会关注，甚至解决这个问题，就能为人类进步提供一份总结经验。也就意味着文学创作要有现代意识，也就是人类意识。我在写作选取素材时有两个考虑，一方面，我所用的材料必须都是真实地从生活中长出来的，而不是在房间里面道听途说或编造的东西；另一方面，这些材料一定要有中国文化的特点，呈现的国情、民情，一定要以一种文化为背景。

记者：您的作品关注度最高的是《废都》，那部作品刚出来的时候，许多读

者很好奇您为什么要这么写？难道真的是为了博眼球？您当年的真实想法是什么？

贾平凹：20年前的社会价值观和现在是不一样的。写这本书的时候，大概是20年前了，书中有对社会的观察和对社会的前瞻，其实书中描写的那些情况，已经在社会上出现了。这并不是书的作为，而是时代的作为。社会总有一个前进的规律和趋向，只要你认真关注，总会注意到的，是时代变迁而产生的价值观的变化导致了读者和社会对《废都》从不认可到认可。

按我当时的想法，是用回避的方式，以实写虚。那个时候比较年轻，也不顾忌什么，反正觉得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，把自己想写的表达出来，就写了。但是在当时，社会的道德极限容纳不了，这跟今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书中的性描写只是作为辅助素材和虚构人物的铺垫存在，并非主要内容，在整个作品44万字的总数中，它只有三四千字，所占的比例也是极小的。那些删掉的地方，原来就有内容，不是我故意留下多少个空白格子，是出版社的编辑怕麻烦删了那么多。其实，《废都》这本书的核心是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况和对整个社会的记录。

记者：听说您写作必须要原型，就像画家一定要写生？那么《废都》中的庄之蝶有您本人的影子吗？

贾平凹：对于作家来说，每个人物应该都折射有作者自己的东西，借别人的材料来表达自己的东西，可以说也许都有关系，庄之蝶身上当然有我的影子，但是不能说那个人就是我。

创作中必须要有原型，这是我的一种写作习惯。像盖楼房一样，必须有几个大的深坑来灌柱子，上面才能盖楼房。这几个柱子在我脑子里就是那些原型，有原型后我在写作时，整栋大楼都可能是虚构的，但它跑不到这几个柱子之外，这些原型能把你撑住。如果没有原型，你就漂移开了，落不下来，落不到最实的地方。如果太空，写不下去的时候，就可能采用变形、夸张的句子和情节，这在某些时候或许起到一些变形生活、反映荒唐生活的作用，但掌握不好就会变成对自己真正不了解、对最细部东西缺乏了解的掩饰办法。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来，他哪里熟悉哪里不熟悉。人和人之间、故事背后，它有最重要的“生活气息”在里面。你如果纯粹只写一个事件，但不到现场去具体了解，你获得不了它背后的气息。

记者：您的每一部作品都很受关注，您自己最喜欢哪部？

贾平凹：没有特别满意的，只有比较重要的。我写《废都》的时候40来岁，《浮躁》写于30多岁，《秦腔》写于50岁，《古炉》和《带灯》写于60来岁，他们都是我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，大概每隔10年会有一个转折。有的人喜欢我年轻时候的作品，也有人喜欢我老了的的作品。我自认为年轻的时候写作有技巧，人文的比较少，大多是从史书小说中看来的。年长了之后激情不如年轻时候，但结合的是自己生活、生命中经历感悟和提炼出来的智慧，智慧不是轻易就有的，它是日常生活中切实的体会，慢慢积累，看透了，了悟了的东西。

记者：您的创作在中国文坛饱受争议，尤其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有压力吗？坚持这种创作方式的动力是什么？

贾平凹：现在再回想过去，自己也算是个坚强的人吧。这份坚持或许更应该说是一种执拗，那时候还是比较年轻的阶段，四十出头，当时经历的事情还不是特别多，各个方面的一下子铺天盖地。很长一段时间的压力，周围的人都在说，如果是一般的人肯定就压垮了，因为我表面上比较胆小，但是骨子里面还是比较倔强的。事情过后一想，人生也就这样了，如果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我就不在乎了，也是磨炼出来了。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还是一种启发。实际上，我觉得从那个艰难的时代过来也是一件幸事。

这段经历也让我悟出一些道理，作品只要按真实感受写出来，一时不被理解，以后总有一天会被理解。每本书都有每本书的命运，书和人一样，有的书一产生出来就有好命运，走得很顺畅，有些书就特别艰难。《废都》一路走来是比较艰难的，后面的几本就顺当多了。

记者：创作之余，您还喜欢书法、绘画、收藏等，这些爱好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？

贾平凹：我觉得搞创作的人不管是文学还是艺术，都需要能量很强大，才能创作出好作品。所以优秀的创作者需要吸收各个方面的营养。从纵向来看，一方面需要传统的东西，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，有太多的文化值得我们学习。另一方面，要对现代社会有充分的了解。20世纪以来，中国的作家都在讨论中西结合，传统和现代的融合问题，如何在现代的背景下让传统继续发展？民间性的东西如书法、绘画、收藏等都有很好的推动作用。

农村有种土语说“会推磨子就会推碾子”，反正都是转圈。不管从事任何艺术，最高的境界是一回事。要想把画画好，实际上也是表达，和文学表达是一样的东西，也是创造一种格局。音乐、绘画、舞蹈，最高境界都是一回事。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相通的，也是相互促进的。

记者：听说您在创作一部反映中国人百年生活变化的长篇小说，可否先给我们分享一下？

贾平凹：不是太长。大概今年的九月份就可以出版，具体内容还是留些悬念吧。